

鼓浪屿文史资料

第七辑

音 | 乐 专 | 辑

yin yue zhuan ji

目 录

鼓浪屿音乐文化发展概述	何丙仲(1)
怀瑾握瑜 雪魄冰魂	
——中国现代音乐事业先驱者周淑安	杨 钧(16)
勤耕细耘 桃李芳菲	
——我国著名钢琴教育家李嘉禄	方 菲(30)
中国“咽音”练声法的创始人林俊卿	何丙仲(46)
钢琴教育家王政声	荒 木(59)
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艺术生涯五十年	殷承惠(63)
天下黄河十八湾	
——我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	彭一万(84)
行吟四海的钢琴诗人	
——著名钢琴家许斐平	万 方(103)
天风海涛 琴声乐韵	
——著名钢琴家许斐星	彭一万(121)
高山流水奏华章	
——著名钢琴家许兴艾	万 方(133)
上下求索的艺术改革者	
——著名指挥家陈佐湟	彭一万(147)
旅英著名钢琴家卓一龙女士	何婉菁(151)
鸡母山上的小洋楼	
——著名钢琴家殷承宗一家	陈孝镇(154)

笔架山上的琴声

——“音乐世家”许斐平兄弟之家 蔡文田(160)

音乐岛上的“琴弦之家”

——小提琴家杜守达、杜俊良一家 蔡文田(166)

幸福的“音乐家庭”

——“音乐世家”谢旭、胡朗之家 古 田(171)

李未明教授及其家庭 闻 天(177)

鼓浪屿部分音乐家庭简介

..... 鼓浪屿区文化局 文化馆(180)

一世琴缘 毕生乡情

——胡友义与鼓浪屿钢琴博物馆 方 菲(188)

打造厦门的“史坦威”——黄三元 蔡文田(201)

鼓浪屿之恋(附歌)

——《鼓浪屿之波》曲作者钟立民先生小记 蔡志成(205)

鼓浪屿老歌(附歌) 舒 婷(211)

魂牵梦绕的鼓浪屿

——歌曲《鼓浪屿》创作感想 陈卫东(215)

鼓浪屿(歌词) 正 兴(217)

多情的鼓浪屿(附歌)

——作者谈创作感想 正 兴(218)

鼓浪屿的基督教音乐 潘明亮(223)

创办全省第一个小学音乐班的回顾 叶灿云(229)

厦门市音乐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谢梦鹏(233)

鼓浪屿合唱团 鼓 文(238)

厦门爱乐乐团奏响创业凯歌 厦门爱乐乐团(242)

鼓浪屿音乐厅 李 扬(252)

钢琴码头史话 龚 洁(255)

补白：

- 弘一法师忘情不了音乐……………(62)
- 抗战前夕鼓浪屿的最后一次音乐会 ……(187)
- Auld lang syne ……(170)
- 近代最早接触西洋乐器的中国人……………(29)

鼓浪屿音乐文化发展概述

何丙仲

鼓浪屿素有“音乐之岛”的美誉，其由来，乃近代西洋音乐在这个岛上与中国传统音乐交流、发展，并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鼓浪屿的音乐文化日益健康发展，“音乐之岛”更加引人注目。

—

鼓浪屿是一个充满天籁之声的小岛。其上有日光岩等六七座奇兀而俊美的岩峰和岗峦，花树掩映，周围环拥着沙滩和大海，远近与厦门岛、龙溪、海澄和大担岛等地隔海相对，天风经年吹拂鸣响，海涛日夜往复吟唱。从宋元时期至近代鸦片战争爆发这数百年间，居住在鼓浪屿岛上的人民主要以渔、农为生，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基本上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状态。平静的生活环境使古代鼓浪屿的先民得以留神海浪冲击岸礁时发出的鸣鼓之声，并以“鼓浪”为地名。在宋、元、明时期“南戏”盛行的闽南地区，鼓浪屿之得名，可谓切中这部“天籁之声”的特点。宋代，从内陆山区来到“海滨邹鲁”的理学宗师朱熹，将其感受概括为“天风海涛”四个字。此后，“天风海涛”成为鼓浪屿最有号召力的广告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天风、海涛以及“鼓浪”，都是天籁。鼓浪屿先民生活在风景如此优美、又时刻浸淫着大自然音乐的氛围中。古人想像中的

神仙生活往往有音乐之声伴随，是谓“仙乐风飘处处闻”，所以明代后期有人称赞鼓浪屿是神仙世界，题以“鼓浪洞天”。可见鼓浪屿自古以来便具备滋生音乐文化的天然条件。目前因史料记载所限，我们尚不知道明代之前，《荔镜传》是否在此“作场”，岛上先民们闲暇时如何清唱“南管”或其它地方歌谣。但是可以肯定，生活在鼓浪屿的先民对音乐的感受能力是得天独厚的。

清初，由于台湾底定、版图统一，厦门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上解除“海禁”、设立海关，厦门对台为主的航运贸易事业日渐繁荣。作为厦门之“辅车”和“犄角”的鼓浪屿，其社会经济状况也随之水涨船高。清乾隆年间（18世纪），当地诗人笔下的鼓浪屿已有“千家鸡犬”、“万井烟”的规模，虽然岛上基本上还是丘壑纵横的田园风光，但已出现“错落人家傍水程”的布局 and 风貌，而且“风樯绕岸”，湾澳一片帆樯。当时的厦门诗人薛起凤在诗中提到日光岩曾作戏场，演出戏剧，诗人倪邦良还填词赞美岛上“风清夜，仙宫月满，歌吹遍雕栏”，可见当时鼓浪屿人的音乐文化的内容相当丰富。后人无从知道当年鼓浪屿人“歌吹”的都是何种乐曲，但根据南曲在闽南地区盛行的历史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测当年遍及鼓浪屿雕栏的“歌吹”，除了南曲之外，别无其它。须知18世纪初，正当西方的巴赫将十二平均律付诸钢琴艺术的创作实践之时，大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安溪籍的大学士李光地召集的南曲高手正组团晋京演奏，被皇帝褒奖为“御前清音”，成为闽南传统音乐——南曲最为辉煌的时期。

从零星的文献史料得知，清代的厦门、鼓浪屿，民间大众喜爱南曲、锦歌等，小部分文人雅士则以品赏古琴古筝为高雅。这两种音乐活动概属于自娱自乐的形式。具有社会娱乐功能的，除佛教音乐的梵呗之声外，还有戏剧音乐。清代，宗祠庙宇常是戏剧演出的场所，观众移情于剧情的变化，也陶醉在后台音乐和演员唱腔的旋

律之中。从广义上说,戏剧演出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民间组织的音乐会。乾隆年间“日光岩演剧”,当是有文字记载的鼓浪屿音乐会最早的滥觞。

关于清代厦门、鼓浪屿音乐文化活动,从当时流行的乐器也可得知端倪。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厦门志·关赋略》载有当年从厦门港进出口商品的“关税科则”,其“乐器”一项列有琵琶、三弦、月琴、胡琴、洋琴、笙、大小鼓、大小木鱼、七弦琴、竹笛等。当时厦门没有乐器作坊,上述乐器显系从外地进口到厦鼓或闽南地区使用的商品。这些乐器大部分适用于南曲、锦歌等闽南地方音乐、戏曲的演奏。

二

当鼓浪屿人,或者说闽南人正沉醉于闭目坐唱南曲“孤栖闷”、流连于王昭君千古琵琶的幽怨之时,十九世纪中叶,隔着重洋的欧美大陆正风靡着浪漫主义音乐,涌现出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和勃拉姆斯等大师。他们和稍早已经脍炙人心的那批被称作古典主义音乐大师的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几乎构成了西洋音乐空前绝后的精华。不可思议的是热衷于西洋音乐的欧美“文明”人,就在此时,却扮演着强盗的角色,明火执杖地越洋而来,用鸦片和大炮敲开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大门。1841年8月26日,厦门、鼓浪屿在这场鸦片战争中被英军攻陷。从这一天开始,鼓浪屿还被英军以武力占据,首尾长达5年之久。翌年2月24日,美国传教士第一个赶到鼓浪屿传播基督福音。1843年11月1日,厦门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于是,大批的领事、奸商、传教士接踵而来,纷纷涌入鼓浪屿,建起洋行、领事馆和公馆住宅。传教士更是把鼓浪屿视作传教的据点,抓紧机会向闽南一带扩展势力。鼓浪屿

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历史上,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很早就保持与海外的联系和交往,对待外来文化并不陌生。在西方列强强行上门,国人睁眼看到世界后不久,鼓浪屿人林鍼就飘洋过海,于1847年“受外国花旗聘,方耕海外”,在美国工作一年多。林鍼在美期间,接触到许多从未见到的西洋新鲜事物,其中便有风琴。他在所著《西海纪游草》中写道:“番女虽工诸艺,予独取其风琴,手弹足按,音韵铿锵,神致飘然。”林鍼所记虽略为简单,却要比1866年张德彝在上海才看到的“洋女拨弄洋琴,琴大如箱”,要早了近20年。此前,张氏是被学术界称作是第一个看到风琴的近代中国人。可惜林鍼偏爱“神镜”(银版照相机),倒没有携带风琴回鼓浪屿之念头。

鸦片战争爆发后的40年间,西洋音乐文化如何登陆鼓浪屿,中文文献的有关史料甚少。只能根据部分零星记载进行分析。

(1)1878年英人翟理斯(H. A. Giles)所写《鼓浪屿简史》说,当地有一座专供外国人祈祷的礼拜堂,司库A. W. 贝恩兼任管风琴的弹奏者。该书的“俱乐部”和“娱乐”两章,详尽地介绍鼓浪屿所有为洋人提供的图书馆、各类球场和文体活动设施,除了“一座小剧院,冬季演出许多精采的表演”还跟音乐有少许关系外,无一句话涉及西洋音乐。

(2)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书所载,“通商口岸”开埠后,舶来货品潮涌而来,洋化中不仅有吃西餐的刀叉餐具,也有笨重的洋琴,结果这两项货物因无人问津而大折其本。厦门口岸极可能亦有此现象。

因而可知,西洋音乐刚进入鼓浪屿,因为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只能局限于教堂或小剧院等外国人的生活圈里面。中西音乐文化处于对峙的态势。不过,可以相信这种对峙的局面相当短暂,因为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发展,西方的宗教音乐也逐渐在厦鼓的民

间产生影响。在鼓浪屿，基督教是西洋音乐客观上的传播者，音乐曾经是外国势力向中国人灌输基督教文化的有效工具。

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前已断言，医疗和教育是传教之两翼，尤其是后者更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就厦门、鼓浪屿而言，1870年起外国教会就开始创办女学，很快地便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识字班、女学堂相继出现。鼓浪屿是英、美教会在闽南传教的中心，教会学校更为密集。吟唱圣诗是这些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外国传教士为使基督教进一步在社会扩展，还发明一种厦门话的罗马字拼音方案，鼓浪屿人称为“白话字”，不识字的人通过极短时间的学习，都能用方言诵读圣经，也能根据简谱用方言吟唱圣诗。19世纪50年代，鼓浪屿人就依靠一本只有10首“白话字”的圣诗，接受西洋音乐最初的启蒙。

三

鼓浪屿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国门一经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步步走向黑暗深渊的厄运；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社会产生激化，缓慢而艰难地走向近代化。对外的救亡图存与对内的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中国的仁人志士终于摸索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乃至以后的改良变法和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等力图振兴中华的方略。

鸦片战争之后约40年间，西方列强势力加紧对华侵略的步伐，鼓浪屿是典型的重灾区。这个弹丸小岛上遍布的各国领事馆、洋行和教会，竟成为出名的贩卖华工、走私鸦片毒品的罪恶据点和洋人耀武扬威的地方。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统计在厦（大部分居在鼓浪屿）洋人人数为1850年29人，1855年34人；《鼓浪屿简

史》载,1878年则猛增至200多人。而该年度岛上的人口不足4000人。从现存19世纪一年有关鼓浪屿建筑风貌的老照片上,也能看到西式建筑成片成族、盛气凌人地把闽南传统风格的“大厝”挤到一边,两者极不协调地并存在一起。这足于说明当时洋人在鼓浪屿的势力。然而,几千年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决不是西方文化数十年时间便能冲垮的。中西文化在鼓浪屿也同样经历着冲撞和融合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有鼓浪屿人走向世界的个例来看,两种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也许是近代鼓浪屿的特色。

由于基督教客观上曾经使鼓浪屿人得到西洋音乐最初的启蒙,加上近代基督教的传播势力不断扩展,西洋音乐文化鼓浪屿之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可过高评价。我们认为:(1)19世纪后期,尽管外国列强加剧对鼓浪屿的侵略,基督教会竭尽全力传教,事实上鼓浪屿最终没有成为单一基督教的地方,反而是自始至终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从未改变过;(2)基督教音乐仅是西洋音乐中有限的一部分,它绝对替代不了西洋音乐的全部。正如亨德尔创作《弥赛亚》,但《弥赛亚》只是亨德尔作品的一小部分的道理一样。基于上述这两个理由,尽管19世纪末西洋音乐中的宗教音乐已在鼓浪屿的教堂或教会学校吟唱,但只是在特定的范围里活动,并非在社会普及,有明显的局限性。

西洋音乐在鼓浪屿的勃兴,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归功于19、20世纪之交“新学”教育的创办。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我国经历过“师夷制夷”、“西学东渐”、引进西方科技成果的“洋务运动”和进行制度改革等几个阶段,兴办“新学”这个大势所趋的举措迟至19世纪末期才形成全国性的热潮。音乐教育是“新学”的课程之一。清光绪28年(1902年)上海务本女塾设有“唱歌”这个课程,其宗旨乃“在使谙习歌谱,以养温和之德性、高洁之情操”。可见“新学”的音乐课程才是西洋音乐的普及教育,才是它以后在鼓浪屿兴盛的社会基础。

其意义已非教会为“培养唱诗班人才”者所能望期项背了。

在鼓浪屿,189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即设有音乐课。1906年创办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俗称“上女学”,乃中国人奉当时教育部之命而办的国内首批女子师范学校之一,其课程也有“音乐”一门。当时岛上有条件上学的女孩子都慕名入学。该校培养了林巧稚、黄萱、黄墨谷等优秀的女学者,也造就了周淑安如此杰出的音乐英才。周淑安(1894—1974)于1911年毕业于鼓浪屿厦门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起赴美攻读音乐艺术;1921年回国后致力于西洋音乐在我国的发展,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者。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一直开办到1935年,20多年来象周淑安一样喜爱西洋音乐的学生,自然不在少数。类似的“新学”在厦门、鼓浪屿还有一批,虽然规模有大有小,办学时间有长有短,但事实可以肯定,至迟在20世纪初年,西洋音乐终于被鼓浪屿人所理解和接受。

四

国外宗教史方面的学者往往有意识地突出基督教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作用。1992年,美国学者德·琼格(De Jong)在其所著的《1842年—1952年归正教会在中国》一书的第三章“教育的发展(1900—1937)”中,记述20世纪初西洋音乐在鼓浪屿的发展经过时写道:“音乐也成为一项受人喜欢的课外活动,它经常以绝妙的节目来传播福音。”作者说的是设在田尾的毓德女学,此处的音乐仅是西方宗教音乐。教会迫不及待地让音乐向社会渗透,最大规模的是该书所说的“1916年,一部由33名学生和一支小小的管弦乐队伴奏演出的名为《明亮的星》的大合唱,对(鼓浪屿)华人社会乃是一场全新的尝试。演出在其中一座教堂进行,过道、窗户和入口处挤满了人。从学校弦乐队之备受欢迎而得到启发,寻源书院那位1923

—1926年来华做事的教员乔治·库特牧师(Rev. George Kot)遂于1925年组织了一支有20人的小乐队,这支乐队很快就被许多教会的庆典和城市公园的音乐会所青睐。为华人特别献演的是1921年圣诞音乐会上,由毓德女学20名少女和寻源书院50名青年人演唱的男女声合唱曲。”

德·琼格引用的材料乃当年教会的档案。他在书中不得不悻悻地感慨:“即使5年前(1911年)我们已作过尝试,但群众的感情仍大大不能接受。”殊不知鼓浪屿少女在1908年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已能演唱美国国歌,并受到对方称赞(见本辑关于周淑安的介绍一文),而且1911年还有周淑安之赴美学音乐。可见鼓浪屿群众“不能接受”的不是西洋音乐本身,而是唱诗班充满“福音”教诲的那部分宗教圣乐。20世纪初,鼓浪屿人对西洋音乐的接受,已开始由被动变成主动。这个事实外国学者却避而不谈。

五

西洋音乐在鼓浪屿最为盛行的时代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我们知道,1902年鼓浪屿沦为外国列强势力共同统治的“万国租界”,翌年设立了“工部局”,标志着鼓浪屿成了殖民地。辛亥革命以后,接连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时局不靖的社会状况,闽南地区更是兵匪肆虐,生灵涂炭。相比较之下,鼓浪屿的特殊环境,对广大闽南籍的华侨、侨眷和富商都别具一种吸引力。明清以来,闽南沿海之民有出洋(主要是东南亚一带)谋生之风,近代此风愈盛。旅居异域的闽南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已经扎下根来并接受当地的文化影响。当时东南亚文化又被称作殖民地文化,实际上是间接的西洋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富有

爱国爱乡传统的华侨陆续回国投资创业。在其促动和支持下,厦门城市的近代化建设出现了高潮。1910—1930年间,厦门被建成为东南亚闻名的港口城市。鼓浪屿的近代建筑风貌在此期间也得以定局,华侨、侨眷和富商所建造的具有南洋风格的各种建筑物约占全岛建筑总量的70%。鼓浪屿成为华侨、侨眷建宅定居的好地方,国内外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也常来落脚。因此,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汇聚在一起,形成鼓浪屿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色,也为西洋音乐在那里的盛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0年以后,鼓浪屿西洋音乐的逐渐盛行,还因为:(1)音乐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音乐作为艺术其社会功能日益受到鼓浪屿人民的重视。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设立音乐(或称“唱歌”、“唱游”)课,课外还有歌咏队活动。受欧美校园的影响,鼓浪屿各学校都有固定的校歌,各个年段或者班级,都有师生编词或作曲的“社歌”。教会学校在让音乐服务于宗教的同时,也开始采取顺应形势的举措,如上述德·琼格的著作所提到“20年代中期,(鼓浪屿)毓德女学校的课程相当注意小学音乐教师和教会唱诗班指导的培养”。(2)中西音乐文化开始产生交流,相得益彰。在国外攻读西洋音乐的前驱人物周淑安,回国后不但积极从事西洋音乐的推广工作,还注意从本土文化吸取营养,创作一批中国人所喜爱的西洋歌曲。例如她根据厦门、鼓浪屿特有的佛教吟诵式音乐,以西洋音乐的形式创作了一部《佛曲》,在民间甚为流行。外国音乐家也开始领略到中国乐器的奇妙,努力探索中西音乐的交流合作。德·琼格的《归正教在中国》一书特别提到一位美国女钢琴家敏戈登太太,其名字为Stella Veenschoten,她从1917年来到鼓浪屿后,除抗战那几年外,一直在当地指导音乐活动,或为演唱伴奏,或组织合唱团不时演出,还“开始帮助毓德女学校的乐队使用中国乐器。”著名的钢琴教育家李嘉禄即是她的学生之一。

(3)音乐家庭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洋音乐已逐渐从教堂、学校进入鼓浪屿的家庭。这是家庭成员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彼时许多人留洋后返回鼓浪屿居住,将音乐视为高雅的休闲娱乐的良好风气引进岛内,如留英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留美的工程师林全成和留英并在法国、瑞士学艺术的林克恭等,他们的音乐造诣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一大批业余音乐高手之间的切磋交流,以及家庭成员不时的遣兴和鸣,无形中使西洋音乐通过“家庭音乐会”这种形式对社会文化产生的“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当然,在西洋音乐日逐兴盛的同时,原来流行于鼓浪屿民间的闽南传统音乐照旧经久不衰。据厦门文化耆宿李禧的《紫燕金鱼室笔记》所载,20世纪初厦鼓两岸民间常自发举办南音会唱,有一位80岁的老船工“生毛胜”因“吹箫彻夜,声调宛转”而技压群芳。此外,鼓浪屿黄家渡的何氏宗祠“仙公宫”,海坛路的“颖川陈氏自治会”等都以长年有南曲的演唱演奏而遐迩出名。即便丧事的出殡仪式,也都分别有中西乐器的吹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和闽南本土的“施将军得胜乐”往往交响齐鸣,成为近现代鼓浪屿的一道中西合璧的风景线。

西洋音乐兴盛时期,鼓浪屿音乐人才济济。著名的有音乐教育家周淑安、指挥家蔡继琨、钢琴教育家李嘉禄和王政声、医生兼声乐家林俊卿等等;还有许多业余从事音乐的名家,如林全成(钢琴)、洪永明(钢琴)、朱思明(钢琴)、廖永廉(大提琴)、林克恭(小提琴)、龚鼎铭(中提琴、指挥家)、方连生(小号)、颜宝玲(声乐)等。是时岛上琴声阵阵,歌声悠扬,钢琴密度为全国之冠,音乐人才辈出,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岛。

西方人原来梦想用音乐把鼓浪屿人带进上帝的天国,而鼓浪屿人最后却通过音乐找到艺术的殿堂。

六

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音乐在鼓浪屿不再是花前月下的抒情，而是激发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的精神武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中国的炮声惊醒了鼓浪屿人“世外桃源”、“音乐之岛”的梦。他们纷纷起来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下，鼓浪屿人民联合成立了“反日会”、“鼓浪屿抗日救国会”，青年学生还组织了“抗日宣传队”，走向街头，用激愤的歌声宣扬抗日爱国之情。1936年底，厦门中山公园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民众抗日救亡歌咏大会，鼓浪屿几所中、小学的学生是这次歌咏大会最活跃的力量。厦门沦陷前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以鼓浪屿英华中学、毓德女中、慈勤女中等中小学师生为主的爱国青年组成“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组织学生剧团、学生歌咏队公演，并到黄家渡码头工人俱乐部和龙头海员俱乐部向工人群众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学生歌咏队不但在岛内开展活动，还经常渡海到厦门，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浯江洪流》等话剧，还带领市民群众歌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等抗战歌曲，甚至深入前线阵地或农村，用方言演唱自己谱写的《厦门，你是我老母》、《滚！滚！滚！中国打日本》等歌曲。音乐，成为鼓浪屿人反法西斯斗争的“炸弹”和“旗帜”。现今一些当年参加过厦门、鼓浪屿抗日救亡运动的老一辈人士，还能根据回忆唱出当年的这些抗战歌曲。我们不应该忘记音乐在抗战前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西洋音乐在鼓浪屿渐渐衰微。1945—1949年期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鼓浪屿成立的

厦门艺术协会。该会于1948年由林克恭发起组织，参加者有张圣才、洪永明、龚鼎铭、朱思明、颜宝玲、林桥、郑约惠等。他们绝大多数是鼓浪屿的音乐界人士。成立那天，在鼓浪屿连续举办两场音乐会，节目有洪永明、林桥的钢琴独奏，林克恭、陈泽汉的小提琴独奏，外籍歌唱家勿拉索夫人和颜宝玲、郑美丽等的女高音独唱，丘继川的男高音独唱，陈平汉等的重唱。此外，原先的教会学校毓德女中也举办过若干次音乐会，演出内容已完全不是宗教音乐，如刘梦汉的钢琴独奏音乐会，所弹奏的均是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名曲。然而因内战方殷，国民党政权极端腐败，民不聊生，这些高雅的音乐演出自是闻者寥寥，已无往日的风光。

七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鼓浪屿的音乐文化传统得到更好的发扬。在音乐人才的培养、音乐文化的普及提高和音乐活动场所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1)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数十年期间，中、小学的音乐课程普遍得到重视，音乐课不单是教学生唱歌，还指导学生了解乐器、乐理和中西音乐文化。鼓区几所中小学校课外还组织合唱队、夏令营音乐活动等以启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学生课余从师习艺之风犹存，结果不断有音乐天赋的中小學生脱颖而出，得到机会被选送或考取音乐院校深造，终于成才。殷承宗，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从鼓浪屿走向世界的著名钢琴演奏家。他于1941年出生于鼓浪屿一个充满西洋音乐氛围的家庭，家庭成员和亲友大多都擅长音乐，他耳濡目染于此，7岁开始学弹钢琴，9岁就能登台独奏并举行音乐会。1954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以后相继在中央音乐学院、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先后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和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奖，半个世纪活跃在国内外乐坛上，成为遐迩闻名的钢琴家。许斐平、许斐星和陈佐煌等音乐名家所走过的道路和殷承宗大同小异，他们均出生于鼓浪屿的音乐家庭，少年时代即表现出不凡的音乐天赋，其后得到高等音乐院校的深造，加上自身的努力，终于成为中外闻名的音乐明星。

(2)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得到健康发展。五六十年代，活跃在音乐界的鼓浪屿人，有周淑安(沈阳)、林俊卿(上海)、褚耀武(北京)、杜守达、李若梨、吴天球(北京)、廖永廉、龚鼎铭、阮鸣凤等人。1958年，鼓浪屿的音乐人士组织起来，成立鼓浪屿合唱团，使音乐这一文化艺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焕发出新的青春。该合唱团龚鼎铭发起，参加者有颜宝玲、彭永叔、张佩琪、温绍杰、翁文良、朱鸿模、黄祯德、郑辉升等50多人，另由叶秀懿组织了一支少年合唱队。鼓浪屿合唱团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并和少儿合唱队联合演出，主要歌曲有《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等，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该合唱团经常为厦门市广播电台录音播出或现场直播音乐节目，成为厦门市最受欢迎的一支业余文艺队伍。此外，不仅鼓浪屿各中、小学校有合唱队、小乐队，甚至在岛上的其它企事业单位也多数成立有音乐队伍，如玻璃厂、造船厂也各有职工组成的合唱队。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等节日，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大大地丰富了鼓浪屿的文化生活。鼓浪屿区文化部门还曾组织“鼓岛之夏”音乐会，除了为本地音乐人才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还邀请外地音乐家或在高等音乐院校学习的鼓浪屿籍的学生参加演出，取得相当好的社会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迫切。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鼓浪屿在培养音乐人才，增建音乐活动场所等方面加紧步伐，取得丰硕的成果。

80年代初期，先是在鼓浪屿人民小学和厦门二中先后创办音